

張愛玲的文學史意義

許子東

著

中華書局



張愛玲是一個「五四主流文學史無法安放的作家」。

許子東教授的張愛玲研究，從文本出發，從細節講起，

其本人的許多微妙現象和重要問題，

曹禺都寫愛情故事，三人筆下的男

女關係卻差別極大，這是為什麼？張愛玲

與魯迅、錢理群的作品自意象豐富，卻又都特色分明，原因

何在？張愛玲作品中反映出的她與母親的關係，她與胡蘭成

的關係，是真真假？有幾成真，幾成假？乃至，張愛玲作品

中反映出的男女關係與「五四」作家群體描繪的男女關係，

有什麼不同？其背後意蘊何在？……以此來見出張愛玲的與

眾不同，並在廣闊的時代視野裏勾畫出張愛玲的獨特性及其

文學史意義。

本書提出，從現代文學史看，張愛玲的意義在於她將文

人自己的園地與大眾品味趣味交織在一起，她是一個迷戀都

市的混合現代主義技巧與《紅樓夢》語言的解析市民趣味的

女性感官「傳奇」。同魯迅一樣，她的重要作品不多，卻被

後人越讀越大。

ISBN 978-962-8931-19-4



9 789628 931194



聯合出版集團

Published in Hong Kong

定價：港幣98元

建議上架分類：中國文學 / 文學理論

中華書局

許子東
(著)

張愛玲的文學史意義



□ 責任編輯：映川
□ 裝幀設計：李婧琳

張愛玲的文學史意義

□

著者

許子東

□

出版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鯉魚涌英皇道 1065 號東達中心 1306 室
電話：(852) 2525 0102 傳真：(852) 2713 8202
電子郵件：info@chunghwabook.com.hk
網址：http://www.chunghwabook.com.hk

□

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蘭路 36 號
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3 字樓
電話：(852) 2150 2100 傳真：(852) 2407 3062
電子郵件：info@suplogistics.com.hk

□

印刷

深圳恆特美印刷有限公司

深圳市寶安區龍華民治橫嶺村恆特美印刷工業園

□

版次

2011 年 10 月初版

© 2011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

規格

特 32 開 (210 mm × 153 mm)

□

ISBN：978-962-8931-19-4

序

我第一次寫文章評論張愛玲，是在一九九一年秋冬。

一九八九年我在芝加哥大學做魯思基金會（Lucie Foundation）的訪問學者，次年到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重新讀書。有一門題為「女性主義與中國現代文學」的討論課，用周蕾（Rey Chow）當時很紅的一本討論女性主義和現代性的著作^①作參考書，張愛玲是重點。因為李歐梵教授的主持，東亞系當時吸引了很多學生學者^②。UCLA校園優美出名，常被好萊塢用作外景，但學生停車場卻在學校南門外，停車後要爬坡走二十多分鐘才到教學樓。何況停車費很貴，所以那時我和其他一些同學就把車停在大學南面數公里westwood和rochester路口，在路邊免費泊車，然後再坐一元美金bus直接到北校區。那時正在構思一篇論文，「張愛玲小說與上海小市民社會」^③。我一向有走路、騎車或開車打腹稿的習慣，日後經過某一街角路口建築，常常還會觸景憶及一些曾在此苦思冥想的觀點甚至句子。很多次，我腦子裏一邊在想論文題目「小市民社會」應該怎麼翻成英文^④等細節，一邊在那個街口找空車位，有時要在路口轉來轉去好幾圈，街邊的房子、超市、影印店等都已很熟悉……

萬萬沒有想到，幾年以後我看見《華麗與蒼涼》^⑤裏的照片，原來張愛玲最後的住所就在 Westwood 和 Rochester 那個街口！她用的複印店，她寄書的郵局，就是我寫論文當時常常去的地方……我後來才知道，她死得很淒涼，死了幾天以後才被別人發現，房間裏沒有傢俱。她晚年有時連租房押金都付不起。洛杉磯是一個汽車社會，站在街上，所有的車在你身邊飛馳而去，沒有車簡直像是「次等居民」。可是最後二十年，張愛玲在洛杉磯生活沒有汽車。我很難想像——我們當初在大學裏討論她的作品，知道她隱居著，連李歐梵、鄭樹森也找不到她。我們以為她隱居在比華利山莊，或者聖塔莫尼卡海邊。沒想到她晚年為了躲避所謂蟲子到處搬家，連汽車旅館也住。「生命是一席華麗的袍，長滿了蟲子」，早年的象徵晚年竟成寫實。後來我碰到了曾參與她喪禮並在海上撒她骨灰的南加大的張錯教授，張錯說許子東你就算在街上見到了她，你也不會認識。她戴一個假髮，穿一雙最便宜的二點九九美金的塑膠拖鞋。美國人說法就是，說難聽一點，在超市門口摔跤了你也不敢隨便去扶的老太。我們記得，張愛玲當年的口號是「出名要趁早」，她的一生（一身）追求華麗！九十年代，她名滿中文世界，為什麼要這樣自我放逐，在洛杉磯這樣一個城市，放逐到一個可以說是自絕於世的境地？

胡蘭成（一九〇六至一九八一）的話常不可信，但這一句卻誇張得不無道理。他說站在張愛玲跟前，就是最豪華的人也會感受威脅，看出自己的寒傴。^⑥

從一九九一年至今已經二十年，我所寫的有關張愛玲的文章，只有十篇，其中四篇是學院格式的論

文，三篇是討論學術問題的文章，另三篇是學術講座，或事後整理或現場錄音。放在一起看，我對張愛玲的興趣，或者說「研究角度」卻是一貫的：那就是關注張愛玲的文學史意義，探討張愛玲與二十世紀中文文學發展的關係。

這固然與我的學術訓練背景有關，但也基於我對張愛玲研究的一個整體觀察。我以為過去二十年，兩岸三地對張愛玲的評論，看似十分熱鬧，「張愛玲論」、「張愛玲新論」、「閱讀張愛玲」、「再讀張愛玲」、「重讀張愛玲」等等，僅在書名上避免重複就很難。作品銷量、盜版現象和影視改編票房情況都在顯示張迷之多，「張愛玲學」（鄭樹森語）已在現代文學研究界成為一門「顯學」。但是，在討論張愛玲的文學史地位等基本學術問題時，海外臺灣香港和中國大陸學界其實有很大分歧。作為單獨一個作家，張愛玲的文學成就就勿庸置疑，其文學技巧普遍被稱讚和模仿，張愛玲研究有很多不同角度的細緻深入探討，政治干擾、雙語寫作、男女戰爭、服飾插畫，乃至胡張戀、父母情、親戚網、文友圈等等，都已有大量論文作出種種詳盡細微的文學與史實的對照挖掘考證索隱……但是，如果將張愛玲放到周作人、郁達夫、茅盾、老舍、沈從文、錢鍾書、聞一多、丁玲等人構成的文學史語境中去呢？她是文學史上的一個例外？一個異數？還是一個被時代逐漸放大的支流？甚至是魯迅之後的又一個神話？按黃子平的說法，張愛玲是一個在「五四主流文學史無法安放的作家」。^⑦

在夏濟安把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張愛玲章譯成中文以後，張愛玲在臺灣的文學影響就可以和魯迅在中國大陸的地位相比較了。李歐梵將張愛玲作為討論三十年代「上海摩登」的重要證據。王德威稱張

愛玲為「祖師奶奶」，並整理出一系列後來者的家譜。白先勇回憶和張愛玲同桌用餐經歷，十分自豪。施叔青、李昂等也皆以學習張腔為榮，作家蘇偉貞甚至成了張愛玲的研究者，朱天文、朱天心姐妹的「愛張及胡」更令世人驚奇感佩。總體來說，臺灣和海外的「張學」傾向於將張愛玲視為「五四」以來文學史上的一个例外。夏志清認為她的創作「絕對不受左派小說模式的影響」。^⑧而我的一个研究方向，就是不僅僅將「影響」狹義地理解為「模仿」、「跟隨」、「遵命」，同時也包括「刺激」、「制約」、「對話」、「挑戰」等因素。換言之，我要討論的，正是張愛玲的創作與現代文學潮流之間的應對和反叛關係。

張愛玲被列為臺灣經典作家，但其實她在臺灣的日子屈指可數，所以在臺灣文學史上不無「安放」的困難。張愛玲來過香港多次，生活了好幾年，且每次在香港的經歷都對她的創作有重要影響。弔詭的是，生活在香港的時候，她的作品（《秧歌》、《赤地之戀》、翻譯《老人與海》等）都不是寫香港，而是寫她陌生的鄉土或大海。反而離開了香港，在上海，在美國，她卻在生命的很多不同階段，用不同語言、不同文體反反覆覆不厭其煩講述她的香港生活和香港故事：港大宿舍，日軍攻城，淺水灣，灣仔市場……「張愛玲與香港」，是我計劃中的一個課題。香港其實還一直是張愛玲作品流通的一個港口，夏志清寫作《中國現代小說史》時就是依據《傳奇》的一個香港版本（盜版？），六十年代初劉以鬯的長篇小說《酒徒》裏已有對張愛玲文學成就的很高的評價。直到近年《小團圓》及《雷鋒塔》、《易經》中譯本以及張愛玲與宋淇夫婦的通信等也都在香港率先出版。我在《張愛玲與香港的純文學及流行文學》一文中討論過，為什麼張愛玲對香港文學影響深遠：第一迷戀都市，而香港文學本質上就是都市文學，與多數中國現代作家總要在鄉土

安身立命有很大不同；第二，現代主義與舊白話的結合，香港較早系統引進現代主義文學理論（一九五六年《文藝新潮》），又較多「鴛鴦蝴蝶派」舊白話土壤，故容易出現從旗袍袖口花邊剪出的現代主義；第三是兩個層面的「市民趣味」，既不迴避通俗感性商業包裝，更對小市民生活有歷史價值的理性肯定；第四則是複雜的女性感官，既是女性主義立場，以「常人的文學」對抗「五四」「超人的文學」，表現人類的婦人性與神性，又是從世俗趣味角度批判女性弱點同情女人弱勢。雖然，近年越來越傾向本土化的香港文學研究，可能並不認為張愛玲是香港作家，但至少對我來說，香港是我閱讀張愛玲的一個重要出發點：這本書裏的大部分文章均是在香港寫成的。

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在二〇〇〇年和二〇〇九年主辦了兩次較大規模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我分別參與了這兩次會議的策劃和主持。前一次的題目是「張愛玲與現代中文文學」，正是我最感興趣的課題。夏志清、劉紹銘、鄭樹森、王德威、劉再復、溫儒敏、黃子平、陳炳良、梁秉鈞、王安憶、蘇童、朱天文、戴天等學者作家到會，自是兩岸三地張愛玲研究在世紀之交的一次盛會（詳見本書《張愛玲與二十世紀中文文學》）。第二次會議是我與王德威、陳思和共同策劃，題為「當代文學六十年：1949—2009」。到會的有王蒙、盧瑋鑾、劉紹銘、李歐梵、董橋、北島、鍾玲、鍾曉陽、朱天心、黃春明、陶傑、王安憶等當代名家，沒想到錢理群在會上也發言感歎：「今天整天的會都不斷提到兩個人的名字，一個是魯迅，一個是張愛玲，我們大家談六十年文學發展很難脫離這兩個人。」^⑨《亞洲週刊》關於這次當代文學研討會有詳細報導，標題竟是《魯迅張愛玲照亮當代六十年》。

這樣的標題應該很難出現在大陸（甚至也不大會出現在臺灣，理由不同）。張愛玲研究在中國大陸趨於兩極分化，一方面是市民粉絲的迷戀，張腔通過傳媒的流行，有點等同於小資文化符號。在大學裏也成為魯迅以外數量最多的博士、碩士論文題目。另一方面則是官方的憂慮禁忌和學界的尷尬沉默。政府方面對「張愛玲熱」的憂慮，不僅因為她與胡蘭成的關係，導致有漢奸文人嫌疑（二〇〇五年華東師大籌劃召開張愛玲國際研討會，卻因正值紀念抗戰勝利六十周年而被叫停。上海市靜安區政府計劃修建常德公寓張愛玲舊居，也因有老幹部反對而擱置），還因為張愛玲作品中一些解構革命過程的政治傾向，仍然受到意識形態角度的警惕、批評甚至封殺（如對電影《色，戒》放映後的冷處理，關於《秧歌》、《赤地之戀》的評論在電視傳媒上也仍然是「禁區」）。對於這些意識形態禁忌，學術討論意義不大。但是我覺得更為重要的，更加值得關注的是內地主流學術界近幾年來在張愛玲研究方面的動態傾向，尤其是對張愛玲文學史地位的沉默與焦慮。現代文學這個學科的第一代學者如王瑤、唐弢和錢谷融等，都很少對張愛玲作品有直接的評論。王瑤的學生們，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在他們主編的全國大學教材《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中，也沒有張愛玲的專章。我有次去維也納開會，發言講到張愛玲與「五四」文學之複雜對話關係，李澤厚就說，許子東我很喜歡你的「文革」研究，但關於張愛玲，當年之「冷」是因為政治原因，現在的「熱」恐怕也是由於政治因素。言語間頗有保留的意思。事實上，現代文學研究界，無論是前輩嚴家炎、樊駿、洪子誠，還是同行陳平原、汪暉、錢理群、王富仁、黃子平、孫郁、劉納、藍樓之、凌宇、王曉明、朱棟霖等等，都很少發表有關張愛玲的專著或論文（趙園、陳思和有過文章，陳子善、金宏達主要關心資料）。不

是我的同行們沒看到張愛玲在現代文學研究中的重要性，而是這種重要性「無法定位」，很難「聽話」地被納入既有的現代文學史。張愛玲研究的成績，主要都來自余斌、萬燕、費勇等較年輕學人的評傳。甚至作家當中，被譽為傳承張愛玲傳統的王安憶、蘇童等也並不以學習「張腔」為榮（相比之下，湖南作家若被人稱為有沈從文傳統，或者當代京派作家如果被認為有老舍風味，都是很值得驕傲的事情）。當然，學術界與讀書市場、社會風氣之間有些距離也不一定不好，張愛玲研究在中國大陸市場熱學院冷，其間反差也是一個頗值得注意的文化現象。

我在嶺南大學多年來一直主講中國現代文學史，大部分時間每周要講一位或幾位作家，只有三個作家會佔用兩周時間——魯迅、沈從文和張愛玲。十多年前，在發給同學們的講座提要中有一段關於張愛玲文學史地位影響的簡單概括：

- 一、用「舊白話」（《紅樓夢》、《海上花列傳》技法）寫出現代主義精神：華麗與蒼涼。
- 二、以俗文學方式寫作純文學：大雅之俗。
- 三、批判女人弱點的女性主義創作。
- 四、嘗試華文文學的三種基本模式：在中國用中文寫作；在海外用中文寫作；用外文寫中國故事。

簡而言之，在歷史觀、語言和抒情方式等三個方面對愛國愛民啟蒙救世的「五四」

新文學主流構成某種對話和挑戰，並成為中國現代文學與臺灣文學、香港文學之間的重要橋樑。

今天回頭來看，這個提綱雖然粗疏簡單，卻也一直是我不這本書的研究起點和核心課題。

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五日

註釋

① *Woman and Chinese Modernity: The Politics of Reading Between West and East*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1). 周蕾的另一本書 *Primitive Passions: Visuality, Ethnography,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Cinem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有中文譯本《原始的激情——視覺、性慾、民族誌與中國當代電影》(臺北：遠流出版公司，二〇〇一)。

② 當時參加討論課的同學現在大都在海內外任教，成就斐然，如孟悅（加州大學爾灣分校）、汪暉（清華大學）、史舒美、王超華（洛杉磯加大）、黃心村（威斯康星大學麥迪森分校）、王斑（史坦福大學）、陳建華（香港科技大學）等。

③ 其中一部分後來用中文發表，即《曹禺、張恨水、張愛玲：一個故事的三種讀法》。

④ 現代漢語中「小市民」泛指「城市中佔有少量生產資料或財產的居民。一般屬小資產階級」（《辭海》，上海辭書出版社，一九八九，頁一二五一）。但據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小資產階級」，還包括農民：「如自耕農，手工業主，小知識階層——學生界、中小學教員、小員司、小事務員、小律師、小商人等都屬於這一類。」同時，毛澤東又認為小手工業者、店員和小販等又和貧農一樣屬於「半無產階級」。（《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頁五至六）。可見「小市民」

一詞，雖然今天在知識分子筆下或出自小市民之口，多少有點負面含義，但「小市民社會」的階級屬性及歷史作用，卻是更複雜的問題。所以我在論文題目上沒有將「小市民社會」譯為「Urban Petty Bourgeois」，而音譯為「Xiaoshimin Society」。這裏牽涉到我對張愛玲有關「小市民」言論的解讀方法。

⑤ 香港：皇冠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⑥ 胡蘭成：《論張愛玲》，原載《雜誌》（上海）：一九四四（二）三。

⑦ 《再讀張愛玲》，劉紹銘、梁秉鈞、許子東編，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一年，頁六〇。

⑧ 「She is absolutely uninfluenced by the leftist modes of Chinese fiction……」C. T. HSIAO,《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397.

⑨ 王德威、陳思和、許子東主編：《一九四九以後》，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二〇一〇，頁四四四。

序

張愛玲晚期小說中的「愛情故事」

一

《小團圓》中的母女關係

四三

一個故事的三種講法

七三

物化蒼涼——張愛玲意象技巧初探

一一三

關於《色，戒》：小說與電影

一四一

張愛玲與二十世紀中文文學

一五五

二十世紀中文文學的若干發展線索

一六五

張愛玲與香港的純文學及流行文學

一七五

文學中的上海、北京與香港

一九三

知識分子與大眾：「五四」愛情小說中的啟蒙模式

二一九

張愛玲晚期小說中的「愛情故事」

一

放在文學史上看，我以為《小團圓》至少有四層意義。

一是張愛玲研究的重要資料。尤其是胡張戀，以前只有《今生今世》一個胡版，現在終於有了「張看」的角度。有些細節幾乎一致，如張在溫州為范秀美作畫半途而廢，如分手時摟住脖子深情絕望喚「蘭成」。這些細節很難杜撰，可能確有其事，也可能小說參照了胡蘭成的自傳。但也有很多「羅生門」的地方。當然小說並非史實，只能作參考。小說中